

※學術會議※

「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 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羅燕玲*

一、會議資料

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合辦的「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假香港中文大學舉行。是次會議的召開，既為海內外專家學者提供分享研究成果的平臺，同時亦為慶祝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

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成立於一九八八年，前身為漢達古文獻資料庫，其目的在於將中國古代全部傳世及出土文獻加以校訂、整理，並收入電腦資料庫，然後通過各種媒體出版，為研究者、教育界提供學術工具與文化寶庫。在過去二十年，中國古籍研究中心已完成了多項與傳世及出土文獻相關的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通過書刊、電腦軟體及互聯網絡資料庫形式出版。「古道照顏色——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舉辦，為中心在過去與未來的工作，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

會議以先秦兩漢古籍研究為主題，內容包括：（一）出土文獻和傳世古籍的互校與互證；（二）古籍義理詮釋；（三）古籍傳統注疏研究；（四）古籍整理與出版；（五）古籍數位化研究；（六）古籍今注、今譯、外語翻譯；（七）古籍研究工具書的編纂。會議分為主題演講及論文發表兩部分，大會邀得林慶彰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裘錫圭教授（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教授（挪威奧斯陸大學東歐與東方語文系）及安樂哲 (Roger T. Ames) 教授（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為主題演講嘉賓，發表了

* 羅燕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博士生。

精彩的演說。另外，來自兩岸三地、澳門、新加坡、日本、韓國、比利時、丹麥及荷蘭各地的同行專家對會議表示了大力支持，提交論文達八十多篇，分九場發表。

二、主題演講內容摘要

四場主題演講集中在會議首天舉行，裘錫圭教授演講的是〈再談古文獻以「執」表「設」〉，這個題目承〈古文獻中讀為「設」的「執」及其與「執」互譌之例〉一文而來，在演講中，他補充了周代青銅器銘文中以「執」表「設」的一些例子，如西周中期的夔公盃，裘教授與李學勤先生均將「執征」之「執」釋讀為「設」；春秋晚期的浙川和尚嶺二號楚墓出土的青銅「鎮墓獸座」，銘文上有「且執」一語，裘教授認為可讀作「祖設」，指行祖禮時的陳設。此外，他又列舉了大量在竹簡、帛書和傳世典籍中「執」當讀為「設」的例子，如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第一簡簡背題有「執備」，包括裘教授在內的整理小組最初讀為「勢備」，而在演講中，他則糾正「執備」當讀為「設備」，意指人類自設兵器舟車等物以為備；《禮記·禮運》記「大道既隱」後須講禮義，「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裘教授認為「執」應讀為「設」，因為古書中說到置立官爵或仕人以職時，往往用「設」字，〈禮運〉「在執（設）者去」，指在朝廷所設之位者，而「設」與「去」的意義亦正好相對。另外，賈誼《新書·道術》：「鏡義而居，無執不臧（藏），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裘教授指出「執」應是表「設」的「執」的形近誤字，《文子·上德》：「鏡不設形，故能有形。」《淮南子·原道》：「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皆可證之。總結部分，裘教授談到「執（設）」、「設」二字使用的歷史情況，指出現有先秦文字資料似乎只用「執」而不用「設」來表示「設備」的「設」，確實可信的表示設置之義的「設」字，似始見於秦始皇泰山刻石的「建設長利」句，而在西漢時代，大概除了傳抄古書外，已經以用「設」為主，惟文人著書時還是比較喜歡以「執」表「設」。到了東漢，「執（設）」字的使用可能已趨於絕迹。另外，由於資料不足，統一前秦文字及戰國時代楚國之外的東方國家中，「執」和「設」的使用情況還不很清楚，裘教授希望新資料的發表和發現能使這個問題早日得到解決。

何莫邪教授的題目是“The 4th century B.C. Guodian MS entitled: 凡物由亡生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他從比較角度探討了郭店楚簡〈語叢一〉以「凡物由亡

生」為首的一批簡的語義。例如，〈語叢一〉簡五十五至五十六：「為孝，此非孝也。為悌，此非悌也。」何教授翻譯為：“If one makes a point of showing filial piety, then that is not filial piety; if one makes a point of showing brotherly love, then that is not brotherly love.”他指出，此處的「為」(make a deliberate point of practising)含有刻意性，簡文的意思，是指「孝」、「悌」應當是發自內心的，若刻意為之，則不是真正的「孝」、「悌」。同樣地，簡八十三：「人亡能為。」何教授翻譯作：“The person is one can in no way deliberately make a point of being.”指「人」不能刻意而為，他更進一步推測，簡文或可修正為「〔仁〕亡能為」，指「仁」不是刻意的作為。至於《老子》第二十九章：「為者敗之，執者失之。」(If one goes deliberately about things, one ruins them; if one clings to things, one loses them.)當中的「為」與上述簡文的「為」語義相同。另外，〈語叢一〉簡一〇四：「凡物由望(亡)生。」(In principle, things originate from where they are absent.)何教授引《老子》第四十章：「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The myriad creatures in all under Heaven arise from Existence, Existence arises from Nothingness.)為比較，說明簡文的「有」和「無」並非事實的描述，而是一種抽象的哲學思維，關係到對宇宙生成的探討。

林慶彰教授主講〈戰國至漢初傳記之學的形成〉。他指出，在中國經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春秋以前還無所謂「經」，戰國以後，「經」的觀念才慢慢形成，而戰國至漢初，則是經書注解萌芽、興盛的時期。林教授所說的「傳記之學」，包括了傳、說、記等注解形式：「傳」很早用作訓詁用語，如今本《儀禮·喪服》即有「傳」，都是解釋經文的文字，另外，記錄人物事蹟的文字也可稱為「傳」，如《史記·伯夷列傳》中，司馬遷述伯夷事蹟時曾引軼詩傳；「說」是口頭解釋經典的文義，約在漢代經師時始著於竹帛；至於「記」，《漢書·藝文志》有「記百三十一篇」，班固自注「七十子後學所記也」。說禮的文字可稱為記，史籍、史書也可稱為記。其中，傳和記的時代比較早，重要的經書多有傳和記，說的出現則較晚，大都口頭流傳，保存不易。林教授繼而綜述了《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傳記之書，當中，今存《易傳》、《儀禮》的〈服傳〉及「記」，〈藝文志〉均未有提及，著錄還相當疏略。他又指出，經和傳、記本各自成書，從漢至魏晉逐漸結合在一起，至於結合的時間與過程，各經傳不盡相同，如《周易》經傳的結合時間長達二百多年，經歷費直、鄭玄、王弼三人之手；《毛詩》的經和《故訓傳》本亦分開，經傳的結合最早在鄭玄作《毛詩箋》以前已經出現。最後，林教授總結了傳、

記的幾種特質：（一）釋經簡潔扼要；（二）闡發經書微言大義；（三）豐富經書的內容；（四）保存古書逸典，他補充，這四點並不是傳、記的全部特質，但已足以肯定傳、記對經的輔翼作用及其在整個經學史的重要性。

安樂哲教授則討論了「為人」和「成人」的問題，他主講的是“Human ‘Beings’ or Human ‘Becomings’? Another Look at ‘Wuxingpian’”（〈為人抑或成人？再讀〈五行篇〉〉）。安樂哲教授首先指出，傳統西方哲學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理解人之存在 (human beings)，認為人是永恆、現成和自足的靈魂；而儒家傳統則著重成人 (human becomings) 的過程，強調人在經驗歷程中的成長和化育，他將之視為儒學的審美計劃 (aesthetic project)。安教授引新儒學家唐君毅所講，中國宇宙論包含「性即天道觀」，說明「人性」是暫時性的、一般化的配置，但卻與周遭事物不斷地互動而修正，並因而變得恆久，所以「人性」是在天道中對仁的不斷實踐。安教授認為，孟子的「四端」說亦具有過程性的特點，他利用長沙馬王堆及荊門郭店出土的簡帛〈五行篇〉，來證明孟子所說的「四端」是成人的原始條件，是與生俱來的本性；同時，「四端」如〈五行篇〉中的「四行」一樣，源自家庭中個人的雙向角色和與家人的關係，並非所有人先於社會的天生性質，因為人是透過關係和雙向地被界定的，而家庭正為培養良好道德的入口與基礎。

三、會議論文總覽

第一場：

沈 培（香港中文大學）：〈《上博（七）》校讀拾補〉

劉 釗（復旦大學）：〈說秦簡「右剽」一語並論歷史上的官馬標識制度〉

Arnd Helmut Hafner（陶安）（東京外國語大學）：〈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簡 121-4 與簡 107-9 編排辨正〉

吳小強（廣州大學）：〈睡虎地秦簡《日書》占卜用語習慣與規律分析〉

朱曉海（國立清華大學）：〈《周易》中的「貞」字〉

羅燕玲（香港中文大學）：〈王弼《周易注》同於鄭玄說考〉

賴貴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黃以周《十翼後錄》手稿析論〉

謝向榮（香港大學）：〈上博簡《周易·繆》六三斷占辭考異〉

潘銘基（香港中文大學）：〈《史記》、《漢書》避諱情況研究〉

李炳泉（魯東大學）：〈《漢書·百官公卿表》校箋〉

方 銘（北京語言大學）：〈《漢書·藝文志》載傳世戰國諸子著作辨〉

陳鴻圖（香港中文大學）：〈《史記·六國年表》「因《秦記》」探論〉

第二場：

嚴宇樂（復旦大學）：〈彌縫孔老，排拒商韓——蘇轍《老子解》對老學的重整〉

鄒元江（武漢大學）：〈「道」何以「法」「自然」〉

王彥坤（暨南大學）：〈讀《詩》四法〉

陳尚君（復旦大學）：〈《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校訂緣起〉

曹建國（武漢大學）：〈兩漢詩賦引《詩》考論——《先秦兩漢典籍引《詩經》資料匯編》補遺之一〉

吳儀鳳（國立東華大學）：〈論張衡二京賦的創作〉

杜明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小戴禮記》的成書及其在兩漢時期的流傳——洪業《禮記引得·序》商榷〉

陳雄根（香港中文大學）：〈《禮記》與先秦兩漢典籍互見文例雜誌〉

楊靜剛（香港公開大學）：〈傳世及出土先秦文獻互證——以周代封建禮儀研究為例〉

第三場：

李 銳（北京師範大學）：〈「朝請」與「朝廷」——簡本《文子》與傳本《文子》的一個重要異文研究〉

文映霞（香港城市大學）：〈今本《文子·下德》與《淮南子》相關篇章對讀〉

何志華（香港中文大學）：〈今本《文子》因襲《大戴禮記》證：兼論「朝請」、「朝廷」兩詞淵源〉

關子尹（香港中文大學）：“Abstract Concept Formation in Archaic Chinese Script Forms: Some Humboldtian Perspectives”

Yum Jung-sam（廉丁三）(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in *Xu Shen's Shuowenjiezi*”

胡 偉（華南師範大學）：〈秦簡第二人稱代詞謙敬功能研究〉

單周堯（香港大學）：〈讀《春秋左傳注》札記五則〉

- 張高評（國立成功大學）：〈《春秋》書法與詩化修辭——以《左傳》之敘事藝術為例〉
- 簡逸光（佛光大學）：〈《穀梁傳》三科九旨說〉
- 喬家駿（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論揚雄《太玄》陰陽觀要旨及其對《易傳》陰陽涵義之承繼與發展〉

第四場：

- 丁思志（香港大學）：〈試評〈白狼歌〉之壯語破譯〉
- 司徒國健（香港大學）：〈《牡丹亭》引《史》、《漢》考辨〉
- 劉剛（廣東海洋大學）：〈文獻的自覺（一）——先秦文獻的一般特點〉
- Jens O. Petersen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formerly): “The *Zuo*zhuan Story about *Qi Xi* and His Recommendations and Its Sources”
- 蕭敬偉（香港城市大學）：〈讀章炳麟《春秋左傳讀》小識〉
- 許子濱（嶺南大學）：〈《左傳》所記齊莊公殯葬禮考釋〉
- Paul van Els (Leiden Univers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Wenzi*-Studies”
- 鄭麗娟（香港中文大學）：〈今本《文子》、許慎、高誘釋讀《淮南》考〉
- 王三峽（長江大學）：〈再論「傳本」《文子》〉

第五場：

- 陳致（香港浸會大學）：〈金文與《詩經》中的成語〉
- 陳英傑（暨南大學）：〈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
- 徐在國（安徽大學）：〈《戰國古文字典》所錄陶文研究〉
- 鄧佩玲（香港教育學院）：〈《詩經》祝嘏與金文新證札逸——〈周頌〉「迄用有成」及「迄用康年」辭義重探〉
- 方勇（華東師範大學）：〈莊子在秦漢時並不寂寞〉
- 廖名春（清華大學）：〈《老子》「尚仁」說辨證〉
- 陳錫勇（中國文化大學）：〈《老子》訛文誤釋舉證〉
- 劉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多元文化的融匯與三輔文人群體的形成〉
- 盧鳴東（香港浸會大學）：〈朝鮮禮書中先秦兩漢婚禮資料的使用情況〉
- 李興寧（輔英科技大學）：〈從禮教與正史探究先秦兩漢時期女性貞節觀念的深化〉

與衝突〉

第六場：

- 李宗焜（中央研究院）：〈牛運震《論語改正本》與《論語隨筆》〉
- 車行健（國立政治大學）：〈試析鄭玄《論語注》中的經注思考與義理風貌〉
- 勞悅強（新加坡國立大學）：〈文本以外之詮釋——論漢人說《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章》〉
- 徐志嘯（復旦大學）：〈《離騷》今譯質疑——與文懷沙先生商榷〉
- 陳煒舜（佛光大學）：〈《楚辭書目五種正續編》補考〉
- 黃志強（香港大學）：〈翟理斯評鶯韋利英譯〈大招〉商兌〉
- 常 森（北京大學）：〈簡帛〈五行〉與《詩經》、《尚書》之學〉
- 楊澤生（中山大學）：〈上博簡〈用曰〉中的「及」和郭店簡〈緇衣〉中的「出言有及，黎民所慎」〉
- 宗靜航（香港浸會大學）：〈從語言角度探討《尚書·胤征》的成書年代〉

第七場：

- 張錦少（香港中文大學）：〈讀新見王念孫《呂氏春秋》手校本雜誌〉
- 徐文武（長江大學）：〈《鶡冠子》校勘記〉
- Carine Defoort (K. U. Leuven): “Why Did *Yang Zhu* Not Want to ‘Li tianxia’? Debates on ‘Benefit’ in Late *Zhou* and *Han* Texts”
- 張豐乾（中山大學）：〈子學時代的「說詩」問題〉
- 葉 勇（香港大學）：〈〈葛覃〉篇禮說探微〉
- 曾志雄（香港中文大學）：〈〈周頌〉的年代〉
- 蔡根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詩經》「〈邶〉、〈鄘〉有目無詩說」再考〉
- 鄧國光（澳門大學）：〈先秦「王道」義背景中的「聖王」觀〉
- 簡良如（國立清華大學）：〈在經學中之歷史〉
- 張賢明（中山大學）：〈清河郡本《緯書》的讖緯文獻價值〉

第八場：

- 齊婉先（明道大學）：〈從「至尊」觀念論《荀子·禮論》詮釋喪禮之教化意義及

方法〉

陳曙光（香港中文大學）：〈《孔子家語·在厄》「孔子厄陳蔡」探源〉

寧鎮疆（上海大學）：〈縱與橫——《孔子家語》研究中的傳本問題〉

游志誠（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周易》文學新論〉

許云和（中山大學）：〈德藏吐魯番本漢班固〈幽通賦〉並注校錄考證〉

朱寶盈（香港中文大學）：〈從《論語》與《禮記·樂記》的美學思想比較看朱熹
《詩集傳》鄭風「淫詩」說〉

鄧駿捷（澳門大學）：〈劉向的憂患意識與學術實踐〉

鄭傑文（山東大學）：〈古佚書整理芻議〉

梁德華（香港中文大學）：〈荀悅《漢紀》整理《漢書》方法探究〉

末永高康（鹿兒島大學）：〈《曾子》十篇考〉

第九場：

李雄溪（嶺南大學）：〈「《詩經》辭典」述評——兼論古籍辭典的編纂〉

戰葆紅（學苑出版社）：〈學苑出版社古籍圖書出版概述〉

潘薇妮（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大學中國古籍研究中心歷年出版成果簡介〉

會議論文涉及的内容非常廣泛，而《詩經》、《周易》、《春秋》經傳、《文子》及出土文獻的研究則是研討會的重要課題。《詩經》研究方面，王彥坤發表〈讀《詩》四法〉，即：繫源推義法、比興承應法、多章合參法和補足省文法，分享了讀《詩經》的心得；曹建國〈兩漢詩賦引《詩》考論〉，為《先秦兩漢典籍引《詩經》資料匯編》補遺，並討論了漢代詩賦引《詩》的意義；張豐乾〈子學時代的「說詩」問題〉，探究《詩》如何作為先秦諸子共同的學術背景，並梳理了先秦諸子對於《詩》在總體上有何種立場；葉勇發表〈〈葛覃〉篇禮說探微〉，探討了《毛傳》以禮釋《詩》之意，並比較了《毛傳》、《鄭箋》的異同；曾志雄發表〈〈周頌〉的年代〉，根據近年金文研究及古漢語分析的成果，為〈周頌〉三十一篇作了分期斷代的嘗試；蔡根祥發表〈《詩經》「〈邶〉、〈鄘〉有目無詩說」再考〉，證明了在戰國以前，《詩經》的〈邶〉、〈鄘〉、〈衛〉風中，本有詩篇存在，而非漢儒將〈衛風〉析出而置入；朱寶盈〈從《論語》與《禮記·樂記》的美學思想比較看朱熹《詩集傳》鄭風「淫詩」說〉，指出《詩集傳》衛風「淫奔」說

表面看來紹承《論語》的評價，實質〈樂記〉的影響更為深刻；李雄溪〈「《詩經》辭典」述評——兼論古籍辭典的編纂〉，則分析了各種「《詩經》辭典」的特點和得失，進而說明了古籍辭典編纂的一般準則。

《周易》研究方面，朱曉海發表〈《周易》中的「貞」字〉，利用各種文獻及出土材料，指出《周易》卦、爻辭中的「貞」字不當訓解為一般意義的求問；羅燕玲〈王弼《周易注》同於鄭玄說考〉，對鄭玄、王弼及漢人《易》注進行了比較，推測王弼《易注》用康成說的情況；賴貴三〈黃以周《十翼後錄》手稿析論〉，從黃以周的《易》論，觀照在清代《易》學發展史中，先秦兩漢《易》學較不為學者注意的學術側面；謝向榮〈上博簡《周易·解》六三斷占辭考異〉，考訂了竹書、帛書與通行本〈解〉六三爻辭「貞吝」或有或無之異；喬家駿〈論揚雄《太玄》陰陽涵義及其對《易傳》陰陽涵義之承繼與發展〉，分析了《太玄》對於《周易》「陰陽」觀的承襲與應用發展之處；游志誠〈《周易》文學新論〉，對卦、爻辭作了文學分析，並討論了《十翼》與古代文論的關係。

《春秋》經傳研究方面，單周堯〈讀《春秋左傳注》札記五則〉提出了修訂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當注意的問題；張高評〈《春秋》書法與詩化修辭——以《左傳》之敘事藝術為例〉，採錢鍾書「《春秋》書法，即文章之修辭」之說，參考現代修辭理論，從用晦、貴曲、崇虛、尚簡、取代五方面討論了《左傳》的敘事藝術；簡逸光〈《穀梁傳》三科九旨說〉，認為《穀梁傳》亦有「三科九旨」，值得提出作為詮釋《春秋》經典意義的新理解；Jens O. Petersen “The Zuozhuan Story about *Qi Xi* and His Recommendations and Its Sources” 探討了《左傳》的史學性及思想體系；蕭敬偉〈讀章炳麟《春秋左傳讀》小識〉對《春秋左傳讀》的若干訓釋做了探討，說明了此書在《左傳》學史上的價值；許子濱〈《左傳》所記齊莊公殯葬禮考釋〉對《左傳》所記齊莊公殯葬禮中「側」、「士孫之里」、「四鬻」、「蹕」、「下車七乘，不以兵革」等關鍵詞進行考察，以為《左傳》的這段記載尋求合理解釋。

《文子》研究方面，李銳〈「朝請」與「朝廷」——簡本《文子》與傳本《文子》的一個重要異文研究〉認為八角廊竹簡《文子》的「朝請不恭」與今傳本的「朝廷不恭」是異文關係，不能為竹簡《文子》斷代，而《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中有「朝廷而不恭」之語，足證今本文子作「朝廷」是語句通順的；文映霞〈今本《文子·下德》與《淮南子》相關篇章對讀〉通過文字語義、語法結構及內容的比

對，探析了今本《文子》和《淮南子》的關係；何志華〈今本《文子》因襲《大戴禮記》證：兼論「朝請」、「朝廷」兩詞淵源〉則認為，今本《文子》作「朝廷」是對《大戴禮記》的因襲，他並討論了「朝請」與「朝廷」兩詞義訓的不同；Paul van El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Wenzi-Studies*” 回顧過去三十年的《文子》研究，總結了《文子》研究中已解決和未解決的難題，並提出竹簡《文子》所帶來的新思考方向；鄭麗娟〈今本《文子》、許慎、高誘釋讀《淮南》考〉比對今本《文子》對《淮南》之疏釋，再比合《淮南》許、高兩家注文，論述了《淮南》許、高《注》與今本《文子》釋讀《淮南》之異同；王三峽〈再論「傳本」《文子》〉則認為，今本《文子》與《淮南子》互見文字同出於「傳本《文子》」。

與出土文獻相關的論文尤多，簡帛方面，沈培〈《上博（七）》校讀拾補〉對《上博（七）》新見的「一」、〈武王踐阼〉的殘字「昌」、〈凡物流形〉的殘字「色」、〈吳命〉中的「必」和〈凡物流形〉中的「誨」做了考訂；劉釗〈說秦簡「右剽」一語並論歷史上的官馬標識制度〉結合漢簡資料，指出「右剽」之「剽」應讀為「標」，乃標誌之意，指在馬身上烙的印記，他並以牛馬的標識出發，對秦漢的公物標識制度進行了分析和總結；陶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簡 121-4 與簡 107-9 編排辨正〉剖析身分在秦律中對刑罰適用所起的作用，從而闡明了《二年律令》簡 121-4 與簡 107-9 這兩條律文的法律涵義；吳小強〈睡虎地秦簡《日書》占卜用語習慣與規律分析〉通過比較研究勾勒出《日書》占卜用語的時代內涵及與先秦諸子思想的關係，並對《日書》若干古詞義提出了新的詮釋；胡偉〈秦簡第二人稱代詞謙敬功能研究〉通過考察秦簡第二人稱的謙敬功能，指出上古只有封建文人或士大夫言語對稱使用「爾」、「汝」才可能有謙敬功能，而在老百姓實際口語中，常用的第一、二人稱代詞「我」、「吾」、「爾」、「汝」等在上古前後期一直都是通稱形式，不具謙敬功能；常森〈簡帛〈五行〉與《詩經》、《尚書》之學〉將簡帛〈五行〉篇放到《詩經》學發展的背景上討論，指出〈五行〉和《詩經》學的傳統具有密切關係；楊澤生〈上博簡〈用曰〉中的「及」和郭店簡〈緇衣〉中的「出言有及，黎民所慎」〉對傳抄古文和楚簡中的「及」字進行了比較研究，並指出「出言有及」當是出言有及古之法度，而「慎」則訓為「重」。金文研究方面，楊靜剛〈傳世及出土先秦文獻互證——以周代封建禮儀研究為例〉比較傳世文獻如《左傳》及出土文獻如〈大豐簋〉、〈麥尊〉等的記載，考定了周代封建諸侯時所使用的禮儀；陳致〈金文與《詩經》中的成語〉考察兩周金文所見與《詩

經》相同的地方，認為多數金文與《詩》的作者都在用當時成語，尤其是祭祀和稱揚中常用的語辭；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對兩周金文各類型以「器主曰」開篇的銘辭進行梳理，指出這種銘文在西周晚期曾是器主承繼世襲爵位、祭告宗廟時普遍採用的一種銘文寫作格式，並對關於牆盤、逯盤為家譜的說法做了修正；鄧佩玲〈《詩經》祝嘏與金文新證札遄——〈周頌〉「迄用有成」及「迄用康年」辭義重探〉選取〈周頌〉「迄用有成」及「迄用康年」二語，結合其內容形式及與之接近的彝銘祝嘏辭例討論，探討了其中的意義和內涵。另外，徐在國〈《戰國古文字典》所錄陶文研究〉指出了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所錄陶文存在的釋字矛盾、摹寫有誤、序號有誤、明顯漏收等問題，並簡單分析了致誤的原因。

四、結 語

閉幕典禮上，研討會籌委成員沈培教授做大會總結，他感謝各方對研討會的支持，並指出大會鼓勵年輕學者和研究生發表論文，實在難能可貴。籌委會主席何志華教授則展望在四年後的第二屆先秦兩漢古籍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大家能再聚首一堂，分享研究成果。